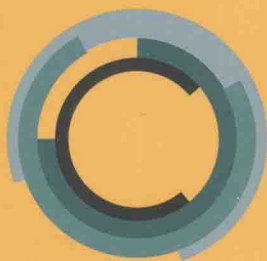


◀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

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

——以1949—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为例

李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资助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

——以1949—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为例

李 明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以 1949—2008 年《人民日报》社论为例/李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10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ISBN 978-7-309-10073-0

I. 中… II. 李… III. 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国-1949~2008 IV. D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567 号

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以 1949—2008 年《人民日报》社论为例
李 明 著
责任编辑/章永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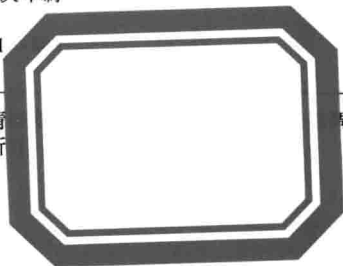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2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73-0/1
定价: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版权所

调换。



序 言

意识形态研究是学术研究的敏感地带,做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吃力不讨好,甚至还会引起某些人的反感,本书作者选择这样的研究题目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也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领域,从社会学、传播学视角研究意识形态的成果相对较少。这种情况并不代表意识形态研究在社会学、传播学领域无足轻重。因为意识形态最基本的功能是对社会的整合功能,社会整合一直以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大众传播媒介则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大力发展社会学、传播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不但能弥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的不足,而且能促进意识形态研究的多学科沟通与对话。本书所展现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

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应尽量排除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理性地讨论问题。一个好的研究应该具备扎实的资料、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方法。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人民日报》社论应该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以《人民日报》社论透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在立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作者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的选择是恰当的。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涵盖 1949—2008 年共 60 年的

《人民日报》社论,由于《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庞大、主题多样,在对社论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必须借助专门编制的社论索引才能一窥全貌,而目前可得的最全的《人民日报》社论索引是1949—1984年的。作者为了探索性研究的需要,也是为了方便概率抽样,走访了南京多家图书馆,再结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信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编制了1984—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索引。作者在探索性研究时,还研读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文献资料,并在本书中进行了详尽综述。以上种种,可见作者处理研究资料的严谨扎实的态度。

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多次提出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仍被广泛使用,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观念的争论与斗争仍然存在。新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家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热度可谓有增无减。在我国,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往往难免夹杂价值因素、情感因素、主观臆断或预设前提,因此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的研究有赖于科学的方法。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研究成果,采用判断式、逻辑推理式研究方法的占绝大多数,经验性研究偏少。判断性研究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但判断性研究成果只有经过经验性研究的证明,才是科学的结论。本书以《人民日报》社论为切入口,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构建起主流意识形态分析的基本框架。作者采用经验性研究方法,将定量内容分析法与观念史研究法相结合。在宏观方面,作者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量分析,不仅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总体趋势、各个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呈现的特点、主流意识形态各个不同

领域的变迁趋势等,还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在微观方面,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研究,讨论了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并重点分析了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和方法。在分析和论述过程中,作者基本做到了客观中立、有理有据。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回避有关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而是以史为鉴、直面现实,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将定量内容分析法与观念史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作者根据研究资料和研究问题做出的合理选择,在具体研究应用中也是成功的。

本书作者李明博士具有当记者的经历和传播学硕士学位,博士阶段又经历了比较严格的社会学专业训练,加上他在研究方法方面有较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认真钻研,所有这些为他选择和开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尽管作为一名年轻学者的研究,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本书所展现的独特视角、系统分析和探索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我非常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著作,同时也希望李明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努力,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有新的作品问世。

风笑天

2013年9月30日于南大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及意义	4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0
第二章 《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反映	75
第一节 大众传播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	76
第二节 《人民日报》社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84
第三节 《人民日报》社论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	101
第三章 《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107
第一节 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	107
第二节 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	129
第四章 《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	149
第一节 《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变迁 趋势	150
第二节 《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	171
第三节 《人民日报》经济类社论中意识形态的变迁	183
第四节 《人民日报》外交类社论中意识形态的变迁	191

第五章 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变迁与重建	202
第一节 革命与改革：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变迁	203
第二节 改革之后：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重建	210
结语	215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39

第一章 导 论

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9.5米、重约17吨的“孔子”青铜雕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落成。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面向长安街,与故宫相对,地理位置非同寻常。正如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所说:“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的地理位置足以说明它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①国内新闻媒体对这一事件大多进行了比较正面的报道,但民众舆论分歧较大。有人认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雕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尊重,表明了对孔子仁爱思想的推崇,蕴含着人文主义精神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执政诉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是复古倒退,应该撤除。1月15日,人民网发起了名为“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您怎么看?”的网上调查,共有约20 000人参与了调查,其中88.7%参与者认为“国博门前立雕像不严肃,儒学并非所有人推崇”,只有11.2%的人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应该支持”^②。虽然网上调查的样本代表性值得商榷,但支持与反对者之间如此悬殊的比例,也颇为少见。

4月20日,刚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广场竖立百日的孔子雕像

① 蔡文清:《国博北广场新添人文景观9.5米孔子雕像藏三大看点》,《北京晚报》2011年1月12日。

② 《天安门广场附近树立孔子像您怎么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6804219>。

被悄悄迁入馆内的雕塑园。国家博物馆方面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国博改扩建工程整体设计,在馆内西侧南北庭院规划设计为雕塑园,用于安放中华文化名人的雕像,而孔子像是第一尊完成的名人雕像。孔子像雕塑完成后,雕塑园建设尚未完工,故临时存放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广场。雕塑园建设已竣工,所以按原设计方案,将孔子雕像移入馆内雕塑园^①。国家博物馆的官方解释未免牵强。孔子雕像落成仪式上,有很多国家级、省部级官员参加,如果仅是临时存放,何必如此大动干戈?而且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的态度也前后不一,孔子雕像刚落成时,他高调强调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当面对民众舆论反对时,他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又改口说:“不要像很多人一样,把孔子像和政治连在一块。和政治没有关系。……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②可见孔子雕像竖立于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广场,并非有计划的临时存放,竖立 100 天后悄悄迁入馆内雕塑园,恐怕也不是按原规划设计行事。

为什么孔子雕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 100 天后被迁入国家博物馆内?此事件背后有何深意?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政治敏感地区,1919 年以来的很多政治事件与天安门广场密切相关,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天安门广场上任何布局的变动都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必然会引发外界对其政治象征意义进行解读。国家博物馆北门外广场属于天安门广场地区,在天

^① 王琼:《天安门广场东侧孔子像迁入国博雕塑园》,《北京晚报》2011 年 4 月 21 日。

^②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天安门广场孔子像“和政治没关系”》,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82723516/2.html。

安门广场地区安放孔子雕像,应该不是国家博物馆单方面所能决定的,因此其背后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或个人拍板,断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竖立孔子雕像。

国家博物馆背后的支持力量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那么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竖立孔子雕像这么一个政治性标志物,其动因是什么?总结国内外媒体和民众舆论猜测,大致可归纳为两点:①从长远看,对内宣扬儒家传统文化,对外宣示中国的软实力;②从近期看,试图借助儒家传统道德观念重塑社会道德。对此,学术界、传媒界似乎并不认同。清华大学教授张绪山认为,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效的劝善道德伦理以及实在的道德榜样;二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灵敏的惩恶法制机制。这两者相比较,后者更重要。当一个社会过度重视道德教化,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惩恶法治体系时,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沦为说教,整个社会陷于普遍的虚伪^①。因此,光靠竖立孔子雕像,宣扬儒家思想并不能解决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腐败和社会道德堕落问题,况且儒家思想所根植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早已踏上了现代化的步伐,与前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儒家思想与现在社会政治伦理格格不入。

尽管儒家思想在中国2 000多年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在现今中国,它早已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因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备受批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舶来品,与中国传统文化无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儒家思

① 张绪山:《论孔子的复活》,《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儒家思想持批判态度,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家思想被视为落后和倒退的封建文化,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批判是前所未有的。此外,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都没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层面。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传统下,将孔子雕像放入天安门广场区域,其象征意义在于试图将儒家思想成分引入主流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政治冒险。好在主事者仅试探了一下,就浅尝辄止,没有勇气坚持下去了,或者也无再坚持了。主事者可能早已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那为什么还要冒险一试呢?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出了什么问题?

回顾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已不止一次,为什么以前的建构都成功了,为何如今的建构却困难重重? 1949 年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情况如何? 在当今中国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第一节 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及意义

一、研究问题 ■■■■■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并非外在的现象,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观察意识形态本身。在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附着于各种载体,并在这些载体的运行之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研究意识形态应该从研究意识形态附着的载体开始,通过对这些载体的内容、特征、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分析,探讨意识形态的深层作用机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研究的测量对象应该是各种意

识形态载体,即各种意识形态象征形式,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①。国家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阿尔都塞发展了马克思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先将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区别开来,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目标,阶级斗争的胜利导致旧的国家政权消亡,新的国家政权建立,而国家机器是长期存在的,不管旧政权,还是新政权,都必须依靠国家机器维持自己的统治。广义的国家机器包括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即狭义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暴力发挥功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主要包括宗教的 AIE、教育的 AIE、家庭的 AIE、法律的 AIE、政治的 AIE、工会 AIE、传播 AIE(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的 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②。从社会学角度看,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整合。孔德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进步要依靠道德教化^③,而道德教化是实现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的基本途径之一。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而且社会事实不能从个人心理层面去理解,应该从个人之外的集体层面去认识。“神话、民间传说、各种宗教观念、道德信仰等,反映着不同于个人的实在的另一种实在。”^④迪尔凯姆在其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宗教现象的深入研究,意在

①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创造的一个概念,法文为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简称“AIE”。

② [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④ [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揭示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①。韦伯反对迪尔凯姆将社会事实作为外在物研究的立场,主张用理解的方法研究社会行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反对仅从物质生产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的问题,首要并不在于追求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货币量从何而来,而是,尤其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的问题。”^②在此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整合的根本动力。

经典社会学家对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早有认识,并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论述。人类社会进入大众传播社会后,大众传播的发展对意识形态现象的性质和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大众传播工具,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传播 AIE”,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媒介。正如汤普森(John B. Thompson)所指出的:“有了大众传播的发展,意识形态现象才能成为大众现象,也就是,能影响多样而分散的背景下大量人的现象。”^③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由统治阶级主导,主流意识形态利用各种出版物、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甚至统治阶级的政治支持,以强化其社会整合作用。因此,研究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运作,以大众传播作为切入口可谓提纲挈领。

本书的研究的测量对象属于传播 AIE,是 1949—2008 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大众传播社会,大众传媒日益成为意识形态运作

①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②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③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年。

的主要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新闻评论与消息、通讯、特写等其他报刊文体相比,具有更为明确的导向性。在中国,社论是最高规格的报刊评论体裁。社论直接代表报刊编辑部发言,同时代表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意见,重要社论发表前要经上级领导部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不仅直接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还反映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方针和政策。《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前,往往要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或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审阅,有些重要社论甚至须经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社论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政策性和指导性,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因此,以《人民日报》社论作为测量对象,研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是恰当有效的。

本书的研究问题是1949—2008年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建构。由于意识形态是附着于各种载体呈现的,所以本研究将同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测量对象,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机制与变迁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发展的新方向。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反映。通过分析《人民日报》社论的发展历程,追溯《人民日报》社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人民日报》社论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

(2)《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通过对1949—2008年《人民日报》社论数量分布特征的研究,并结合对相关社论文本的研读与对比,探讨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个案的分析与对比,归纳总结主流意识形

态建构的主要方式。

(3)《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分析。将1948—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分为“建国初期”、“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与“深化改革”4个时期,先分析《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变迁趋势,然后就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类和外交类社论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专题分析,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变迁动因。

二、选题意义 ■■■■

从理论层面看,1949年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中采用苏联模式。这种苏联模式源于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划分与对立。斯大林将这一模式发展完善,他进一步强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开展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苏联模式是单一意识形态运作模式,要求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控制,以保证意识形态运作的效果。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严格控制社会资源并有完全的支配权,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虽经“文革”而备受质疑,但仍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间的平均主义状态,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呈现明显的阶层差别。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了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趋势,之前苏联模式下一元化意识形态运作方式已日渐难以进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运作模式应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这是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研究领域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

讨论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离不开国家政体这个大背景。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转型国家,只有通过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政党所建立的“强政府”,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威权主义色彩。威权主义政体的特点是一个政治“强人”高度集权,在经济上追求高增长目标以及经济秩序的规范化;在社会上强调稳定,反对动员民众和民众运动;在政治上强调在宪政体制下活动,不搞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①。目前中国转型期的政治体制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与威权主义相符,在政治层面上明显不符。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因此,在“新威权主义”格局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既要维护中国共产党一元领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免受质疑与伤害,又要兼顾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本书意在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历程,总结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建构的时机与建构的方法,结合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与建构的最新趋势,提出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可能的方向。

从现实层面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世俗生活为导向,追求物质享受的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人们对传统体制下以信仰追求为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日渐淡漠。在传统体制下,“意识形态是精英们操纵的一种关键性杠杆,用以实现政治动员和最大可能的对群众的控制。”^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信仰追求为特征的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了很

① 尹保云:《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② Sartori, G. (1969). Politics, Ideology, and Belief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2), pp. 398—411.